

周立波生平与创作

庄汉新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周立波生平与创作

庄汉新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1214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北京

1051214

周立波生平与创作

庄汉新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江苏丰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093 插页3 字数178,000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50册

统一书号：10263·032 定价：1.45元

《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序

林 蓝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早在左联时期，就已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和进步作家所呼吁。但是，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这一口号是不可能付之于实践，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上。

到了一九四二年，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根据地延安，毛主席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口号，遂使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在文艺工作者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解决。毛主席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评剧院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使各个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中去，随之涌现了大量以工农兵斗争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从而使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进入被剥削阶级垄断了几千年的文学艺术领域，使劳动人民不仅在经济政治上翻了身，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也在文化上翻了身，成为文艺作品和戏剧舞台上的主人公，这

就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开始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自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开始其文学生涯的周立波，他的主要创作活动都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使周立波的文学创作活动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左联时期，他就积极提倡文艺大众化，并在《讲话》发表之前，在鲁艺的《名著选读》的讲课中，他已可贵的指出：“在中国的主题，大部分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一定要走出这狭窄的小巷，走向大野。把农民、工人、士兵、直至狱中的囚徒介绍到文学里来，一定要突破知识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吹起宏亮的军号，而这新的主题，都在现实生活里。”但是，身体力行，付之于实践，真正投身到广大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却还是在《讲话》发表之后。周立波是《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口号的忠实执行者，他此后的所有作品——《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以及短篇小说，全部都是工农兵题材，是《讲话》发表后的具体创作成果。也就是说，他是《讲话》所开创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新的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我认为，这是周立波创作活动的首要特点。

周立波创作活动的特点之二是，自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前，直到他辞世的七十年代末，他的创作活动和中国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紧密相联。作为党的文艺战士，他紧紧追随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没有停步。他以其作品忠实反映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主题——从抗日战争到东北土改，从解放后的

工业重建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遵命文学”的代表作家。

历史在继续前进和发展。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过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路线拨乱反正之后，当前，自农村到城市，正开展一场新的革命——经济改革。我们的国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民主革命完成，经济私有制已被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作为阶级整体、剥削阶级早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是残余表现的今天，在已属于劳动人民行列的经过多年社会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的今天，在新一代工农兵多具有文化知识，已成为文化的创造者的今天，据此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为文艺题材开拓了无限广阔的新领域，使我国的文艺运动随着经济改革的迅速发展，也进入到一个盛况空前的新时期。周立波所描写过的农村，已由过去的农业合作化演进到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周立波所描写过的农民，也已变化成长为过去难以想象的新人。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都是错误的，这不等于说我们应当否定历史。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没有延安，就没有天安门。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过去。因此，作为《讲话》发表后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如象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已离我们永去的周立波、赵树理与柳青，和尚喜健在的孙犁与梁斌等，都依然是我们文学宝库里的可贵财富。对他们的作品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目前，应当说，对这一代作家及作品的研究是不够重视

和开展很少的。因此，热爱立波同志著作，潜心研究立波同志著作多年的庄汉新同志的《周立波生平与创作》一书的出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不揣冒昧，对我所知的周立波，简单写了如上一点理解，是否确当，请作者和读者指正，并以此纪念立波同志逝世的六周年。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于南沙沟

目 录

《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序	林 蓝	1
第一章 生平概述		1
第二章 文艺思想初探		37
第三章 《在鲁艺的〈名著选读〉讲授提纲》新论		76
第四章 创作道路和风格流变		91
第五章 诗歌赏析		101
第六章 散文漫评		129
第七章 短篇小说艺术		149
第八章 《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人物形象塑造		169
第九章 《铁水奔流》的创作得失		204
第十章 创作年谱		225
附 录 本名·笔名考		251
后 记		254

第一章 生平概述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梧。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文化战士，杰出作家，学者。自一九二八年投身革命以来，他追随真理，矢志不移，时刻听从党召唤，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是以笔作武器，战斗在党的文化战线上的一员骁勇不屈的斗士。他坚决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为我党的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在党的哺育培养下，在革命烈火的熏陶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是新中国诞生初期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他的整个战斗历程和文学生涯一直是同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文化斗争密切相关的。

一、接受革命思想熏陶

一九〇八年八月九日（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周立波诞生在湖南省益阳县资江畔邓石桥清溪村，一个中农兼自由职业者的家庭里。①

当时，国内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湖南灾荒严重，“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乎

①参见《人民文学》1981年第11期第51页，林蓝《战士与作家》

比比皆是”，在这种形势下，官府竟不顾百姓死活，勾结英、美、日商人继续收购、外运粮食。这样，陷于绝境的群众不得不为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斗争，终于爆发了长沙三月四日抢米风潮。在长沙风潮的影响下，益阳县农民也纷纷进城，捣毁官钱分局，并把一家大地主所设米店抢掠一空。①

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和苦难的岁月里，绍仪开始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周家世代务农，祖父周垂绅，除种田外兼做米生意；父亲周仙梯，是周家祠堂少有的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学堂庶务，学校校长。周仙梯为人正直、老诚，思想开明，有一定进步政治观点，对辛亥革命很表同情。这些都给幼小的绍仪以积极的影响。

那时，周家十几口人，仙梯公靠着祖辈遗留下来的贫瘠田地，小块油茶山，几间竹木老屋和自己的一点微薄的薪俸养家糊口，勉强度日。尽管男耕女织，辛勤劳作，精打细算，全家依然是不得温饱。幼年的绍仪，很小就跟叔叔、哥哥和姊妹们一起放牛砍柴，参加种田劳动。清晨，他在祖父用楠竹丫枝打着墙壁“霍察霍察”的声音惊响下，踏着露水，牵着牛儿去放牧；傍晚，他沐着夕阳，满载柴草，回到清苦的茅舍。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陶冶着绍仪童稚的心灵；乡里穷苦农友勤劳、淳朴、忠厚的美德，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五岁上（1914年），绍仪在父亲任教的私塾发蒙。

①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752——

二年后，正式进周姓祠堂私塾就学，先生是他的堂哥周炳卿。一九一八年秋，插入县立第一初级小学二年级读书，当时学校校长是张敬尧、冷景焘。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学校推行奖励制度，每年期末考试，绍仪成绩都是前三名，因此得了不少瓷杯等奖品。其间，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读过《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一九二一年秋，考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即龙洲书院），编十四班。①

一九二四年秋，在一千多名考生中，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编入三十班。因时局动荡，一中三年换了三个校长。绍仪印象最深，并被绍仪称为可敬的革命校长的是王季范（毛泽东同志的表兄）。王校长亲自发给了他初中毕业文凭。在教师中，对青年绍仪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徐特立、周谷城先生。徐特立、周谷城二先生积极传播“五四”新的革命思想，带动其它教员给学生选讲鲁迅的《故乡》等新文学作品。在先生的鼓动、启发和教育下，绍仪自一九二六年开始注重新文学，接受“五四”革命思潮的熏陶。他和班上吴培元、张金阶、唐之华、刘宗汉等酷爱新思想、新文学的同学一起，发起组织了进步读书团体“夜钟社”。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常在一起交谈革命思想，切磋文学技艺。这反映了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最初的革命追求。一九二六年秋，经表哥林伯陶介绍认识了进步大学生周起应（即周扬，时与绍仪表哥同是上海大厦大学与国民大学的学生，正经长沙去上海）。在林伯陶的陪同下，周起应先到学校看绍仪，绍仪又到旅社专

①据周立波《自传》（未发表）

们看望、求教起应。起应给他谈尼采、庄子等的哲学思想，向他广泛介绍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学，讲述了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新思想、新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热火朝天。在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感召下，大哥参加了当地农会组织，绍仪也离开了书斋，走向社会，积极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他参加过街头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又一村”教育会坪听过郭亮、夏曦、徐特立等革命家激动人心的讲演，并广览《湖南通俗日报》、《向导》、《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报，从中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他热烈追求真理、立志献身革命，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月间，长沙教育会坪公开征收共青团员。他闻讯后立即去签了一个名。可是不久，没来得及谈话和填表，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便遵蒋介石的意旨，一手策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把轰轰烈烈革命的长沙投入到血雨腥风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长沙一片白色恐怖。学校被迫停课。绍仪只好辍学，离开长沙，回到家里。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供给绍仪继续上高中，遵父嘱，绍仪一度在县立第一高小和第二高小任算术教员，聊补家用之急。其间表哥带他再度看望周起应。起应劝他到上海，但因无路费，未成。又听说在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进步文章的曾三是共产党员，想去拜访，打听革命形势，决定下步行动。于是在起应陪同下，去找曾三。但曾三早已离家他去①。在县立第二高小任教期

①据立波《自传》（未发表）

间，他曾公开散布对反革命大屠杀刽子手，县团防局长曹明阵的不满，大骂其屠杀工农的罪行。因而被人告密为赤色分子，受到曹明阵的严厉追查。后由校长张尚斌先生（与绍仪父多年同事，交谊甚深）亲自作保，绍仪才免杀身之祸。此后，立波一直念念不忘这位师长，并在发表文章时，多次用张尚斌的名字作自己的笔名，以示敬重。

一九二八年二——三月，为避曹明阵等国民党反动派加害，为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寻求革命真理，绍仪抛妇别家，离开故乡。随周起应夫妇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短兵相接、殊死搏斗的中心城市——上海。

二、投身上海工人运动和参加“左联”

一九二八年，经过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洗劫后的上海，是一片肃杀凄冷的氛围。最初，绍仪住在公共租界劳勃生路东海里（后搬至北四川路余庆坊），一边在亭子间里自修英文，一边留心职业广告。从这年起，他不断在生活的底层挣扎，曾投考过商务印书馆校对、电影演员、煤球公司跑街，均不中。后曾考取过一家搪瓷公司的练习生，又让给了象他一样困苦的朋友刘宜生。一九二九年秋，他凭着一张假造的信义中学的毕业文凭和几张小学教员的聘书，终于考取了江湾劳动大学，被分配到该校经济系学习。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易培基，系无政府主义者。在校师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因而绍仪有机会结识了共产党人。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共青团C·Y是任浩璋（江苏溧阳县人）和杭东流。任浩璋还可能是党员，常同他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使他大开了眼界，通晓了许多前所未闻

的革命道理。因为他思想进步，积极靠拢革命，被任浩璋等地下党员当作培养对象（当时，党的代号是“大学”，团的代号是“中学”），并吸收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他经常参加散发传单、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

同年十一月六日晚上，绍仪受任浩璋之约，在通往学校的煤渣路上，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散发传单活动。因随后散发传单的杭东流被校方走狗发现，活动暴露。任浩璋与杭东流被校方开除。一九三〇年二月的一天，他又应劳大附中同学之邀去参加上海大示威筹备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一个弄堂的房子里，他出席了由一位女共产党员主持的会议。会上，那位女共产党员对示威作了布置，并发动大家手持铁棍作武器。次日，绍仪参加上海南京路大示威。三月又参加法租界大示威。四月底，因绍仪屡次参加革命活动，引起校方注意和恼怒，终以“品行不良”罪名被开除。这是血气方刚的绍仪革命热情和活力的第一个高涨期。就象初击风雨的雏鹰，在实际革命斗争的洪流中，绍仪经过了第一个回合的锻炼和考验。经过这场考验，他对革命的追求更自觉、更强烈了。五月一日，他在答上海《大众文艺》编者问《我所希望于大众文艺的》文章中，热切盼望“发表几篇很精炼很平白的普罗文艺（即无产阶级文艺）论文，把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树立起来”，“把普罗文艺的内容充实起来。”①便是最生动的例证。

一九三〇年五月初，绍仪从上海回到了家乡。他本想参加红军，后因红军转移，不知去向，未成。远离革命和斗

①引自《周立波选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争，使他痛苦非常。九月，不甘寂寞和沉沦的他再返上海，仍住北四川路底刘宜生那里（和周扬邻近）。这期间，他和周扬同志合译了一部苏联小说——《狗胡同》（又名：《苏联大学生私生活》）。从此时开始，为表达自己立志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和热情，正式启用英语“自由”，（Liberty）的译音“立波”作笔名。同时，又翻译了苏联卢卡契论小说的论文，以周绍仪原名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劳大同学夏伟介绍到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后，神州国光社爆发了工人的自发罢工，要求年关发双薪。立波和另一个校对员小张，主动找到党的领导。立波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工头汤福彪抓住，扭送到捕房拘留。三天后转至上海提篮桥（即西牢）监狱。上海地下党组织闻讯后，曾多方营救，均无效。经江苏省伪高等法院三次公开审理，四月宣判。伪高等法院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煽动工潮”罪，判处立波二年半徒刑。五月五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遇大赦，减刑十月。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刑满时，本该释放，但因其不予悔悟，拒不接受官方让其自首坦白的劝告，又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继续服刑，直至一九三四年七月才交保获释。①这一阶段，立波虽身陷囹圄，历经种种磨难，但是，不论在敌人的法庭上，还是在监狱中，他都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他曾用带镣铐的双手同洋包探搏斗，鼓舞同难者与敌人进行斗

①本节素材参见周立波《自传》（未发表）和《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178页，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争，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崇高气节。他曾抓住写反省汇报的机会借题发挥，大骂叮咬、折磨囚犯的臭虫和蚊子，以此来发泄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端仇恨，弄得狱中训导官哭笑不得。他把监狱当作学习和结识共产党人的好课堂，积极参加狱中党所领导的公开与秘密的斗争。狱中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光辉事迹深深教育了他，革命英烈气吞山河的浩然正气强烈鼓舞着他，使他这个二十四岁的爱国青年，无愧地经受了当年地下工作者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对立波来说，共产主义的一课，是在敌人的监狱中上的。经过两年铁窗生活的残酷折磨，立波不但没有消极、感伤和颓唐，反而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他的心和党贴得更紧了，他要求投入党的怀抱的愿望更迫切了。立波以他对党的无比热爱和向往，以他顽强的斗争意志，经受住了革命途中狂风暴雨的考验。他后来在延安时期所写的《麻雀》等第一组短篇小说，就是这段狱中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

出狱后，他先到上海，再回家乡休养了两个月，又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秘密潜回上海，住周扬隔壁。迫切向往参加革命的立波，不但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且还积极要求到中央苏区，后因路断未成。不久又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全面考察了周立波的历史和革命表现，认为在革命处于危急的关头、在不少人视革命为畏途的严峻时刻，立波以非同一般的革命行动，证明了他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样，由周扬等同志介绍，上海地下党组织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批准了他的申请。

入党后，一九三五年中，立波一人担当了编辑左联秘密会刊的工作。立波在会刊上写了悼念瞿秋白烈士的文章和后

记。鲁迅先生还曾为会刊捐献过三十元。由于经费紧张，会刊仅于六月出版一期。接着调任参加左联党团（时周扬任党团书记，何家槐是成员之一），为党做过一些组织和联络工作。其间，又与王淑明、徐懋庸一起任《每周文学》（《时事新报》副刊）编辑，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六月，计出三十二期。①

自一九三四年秋到一九三七年夏，在参加左联活动的两年半中，立波一方面积极倡导左翼文艺运动，写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介我国左翼作家及作品，论述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及作品，介绍各国进步文学情况，探讨艺术规律的理论文章六十余篇，以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等近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面前，他又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自觉用笔作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呐喊战斗。他为此写下了一批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在《可爱的中华》一诗中，他反复吟诵“我的中华，我的慈爱的母亲大地”，“我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决心与祖国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他以一个赤子的忠诚和勇敢，向祖国发出誓言，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我知道，

这是我还报母亲大地的爱的时候。

向苍天，

我默默的誓言：

①据周立波《自传》（未发表）和《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179页，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